



温州研究集刊

SUN YIRANG ZHUANLUN

俞雄 著

孙诒让 传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

SUN YI RANG ZHUAN LUN



温州研究集刊

ISBN 978-7-213-03873-0



9 787213 038730 >

定价：25.00元

孙诒让传论

俞 雄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序

Preface

俞雄先生与我乃是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同龄人，温州同乡，文史研究工作的同行。在我们尚未见面之前，已有文字上的交往，曾读过他寄赠的《骄鸥远影——温州百年在外学人》（达 50 余万言之巨著），亦知道他长期潜心于温州乡邦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俞雄先生年逾七旬，笔耕不辍，其发表的成果颇具特色，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对近代朴学大师、经学思想家孙诒让的研究，用力最深。早在十年前就发表了《孙诒让的维新思想和实践》、《试论〈周礼政要〉》二篇富有创意的文章，显示了他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上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原则，这也为他最后完成《孙诒让传论》这部上乘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近，俞雄先生寄来《孙诒让传论》书稿，我便先睹为快，深感其治学方法严谨、考据精审，有独具一格的论析特点，提出确实有据、令人信服的新见解，而自成一家言，这意味着他当前对孙诒让的研究有了更高层次的新突破。

本书作者在方法论上，坚信历史唯物辩证法，认为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这正如作者所说，将传主“从总体环境与历史发展中看他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作者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将孙诒让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看成是动态的过程，重视依据时

间的发展,考察传主的心路历程,清晰地勾勒出孙氏思想演变的轨迹。

本书在开头简述孙氏家世和生平后,第二章便以“誉满海内的学术成就”为题,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传主孙诒让作了宏观的历史审视,通过对孙氏学术上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古籀拾遗》、《名原》等,进行具体而细致的考辨和义理分析,更深入地论证了孙诒让开拓创新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作者在论析过程中,充分重视学界有关孙氏之学的研究成果,将诸家之评说予以梳理、归纳而择其善,在此基础上探赜索隐、解难析疑。例如作者对《墨子间诂》的分析,是从清代整个墨学发展史来把握与评论它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赞同近现代诸家对《墨子间诂》的高度评价,正如梁启超所说:“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子》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又说:“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作者除同意上述评价外,更多的是具体论证孙氏治学的考据与义理并举的思想方法,特别指出《墨子间诂》的成就,是孙氏以当时历史现实的“救世振敝”目的而推动墨学复活,又如“墨经”部分含有中国古代科技知识,后人颇为难解,孙氏受西学、西艺(科技)的影响,不拘泥于旧说而求新知,破解了不少墨经《经说》中令人费解的千古疑案。同样对于《周礼正义》,本书作者认为孙氏不是仅停留于校错讹、订正误的训诂、考据和一般义理上的疏解,而更是与当时“兴教自强”的现实相结合,不充当皓首穷经的学究,而是要做务实求真的学者。作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境界,故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孙氏之学的历史贡献作出全面的精确的评价。

本书对当代学者有关孙诒让研究的论著,能集长去短,择其善者而汲取之。对内容上存在语焉不详或持一偏之说者,作者又能详人之所略,有发人之未发的独得之见。例如作者对《周礼正义》和《契文举例》的评析,则是如此。

本书的第三章《从朴学大师到维新思想实行家》。作者以考察思想家心路历程的历史方法,论析了孙氏接触西学引起思想变化及其维新思想的形成,认为孙氏是维新变法的始终坚定的支持者,晚年并有同情革命派的倾向,论点鲜明,论据有力。继而说明孙氏《周礼政要》是维新“更法”的托古改制的依据。对《周礼政要》的不同看法,产生了对孙氏思想评价的严重分歧:究竟是维新还是复古?俞先生对这个非常关键的核心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这首先必须澄清某人所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一书中对《周礼政要》评论的违反历史事实的荒唐论点,妄称《周礼政要》是“符合清政府政治欺骗的需要”,“为清政府骗局的粉饰之作,只是为清政府的伪立宪张目而已”,作者对此据理进行了驳论。作者从三方面分析《周礼政要》的维新主张:政治上要求变革封建君主制;思想文化上要求接受西方文明;经济上要求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本章正面论述孙氏如何为地方维新事业身体力行的种种事迹,分别论析孙氏作为教育近代化的先行者的“富强之源,在于兴学”、“学无新旧,惟其致用”、“普及教育,国民平等”等教育思想。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作充分的论证,论述精彩,展现了孙诒让真实的历史面貌。

在第四、五章《孙诒让成长道路的回顾》、《孙诒让的交往关系》中,作者从孙氏学术成长环境,治学的内容、方法,精神和学术上求变的活跃因素,得益于玉海楼藏书等,作了独具风格的分析论证。尤其对孙氏学术渊源与思想体系形成的源流关系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孙氏学术渊源乃汲取永嘉事功之学、颜元实学、乾嘉学派以及清初顾炎武“经世”思想、晚清早期改良派思想,其论述系统而有特色,条分缕析,体察精微,这种论析特点为他人论著所未有。凡孙诒让学术交往中对其有重大影响者,作者均予以详明、精彩独到的论述,充实了他人语焉不详的内容,甚或填补了为他人所忽视而不可缺漏的空白。文中所论孙氏与黄绍箕的交往、与张之洞的关

系等即属此类。这些部分的论述,都直接关系到对孙诒让思想发展脉络的把握,是论证孙氏思想演变的重要环节。本书作者掌握丰富的地方文史资料,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做出了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本书还附有《百年来孙诒让研究之回顾》,很有学术价值,使这部学术论著更臻完善。总之,这部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富有立体感,将传主写活了。

俞雄先生的《孙诒让传论》,完稿于孙诒让仲容先生逝世 100 周年的 2008 年,非常有意义。这部书是目前所见关于孙诒让研究的颇具特色,较为系统、全面而精详的上乘之作。

今书即将出版,乐为向海内学人、读者推荐。乐为之序。

潘富恩

于 2008 年春

目 录

CONTENTS

序	潘富恩(1)
第一章 孙诒让的家世和生平	(1)
一、孙氏家世与父辈影响	(2)
二、孙诒让的人生历程	(6)
第二章 誉满海内的学术成就	(12)
一、清代三百年朴学之殿军	(13)
二、集历代《周礼》研究之大成	(15)
三、《墨子间诂》催生近代墨学复活	(42)
四、甲骨文研究的开山之作	(52)
五、清代古文字学的最高峰	(60)
六、校勘学与古文献整理	(69)
七、地方文献整理与目录学	(73)
第三章 从朴学大师到维新思想实行家	(91)
一、接触西学和思想变化	(92)
二、孙诒让维新思想的形成	(95)

三、《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维新主张·····	(102)
四、为地方维新事业身体力行·····	(112)
五、教育近代化的先行者·····	(131)
六、孙诒让的教育思想·····	(137)
第四章 孙诒让成长道路的回顾 ·····	(154)
一、“未尝师事人”和家学传承·····	(154)
二、侍父江淮十六年：最好的学术成长环境·····	(156)
三、科场不利的得与失·····	(159)
四、强烈爱国心与可贵的“求变”活跃因素·····	(160)
五、异乎常人的治学精神·····	(161)
六、以专带博与治学上乾嘉诸法并用·····	(164)
七、玉海楼藏书——孙诒让治学的重要助手·····	(168)
八、学术渊源与思想体系·····	(172)
九、对乾嘉学派的继承和局限·····	(175)
十、对传统旧学的矛盾心情·····	(179)
第五章 孙诒让的交往关系 ·····	(186)
一、少年结交的乡里知己：黄绍箕、宋恕·····	(186)
二、曾执“师事”礼的父执辈：俞樾、张之洞·····	(191)
三、治学中共同切磋的挚友：戴望、刘寿曾、刘恭 冕、唐仁寿、谭献·····	(195)
四、金石考释“共嗜”之交：潘祖荫、端方、费念慈·····	(201)
五、投身维新结识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章太炎、汪康年、张謇、盛宣怀·····	(204)
六、支持维新的地方开明官吏：宗源瀚、童兆蓉·····	(212)
七、推进近代兴学的热心骨干：项崧、项湘藻、刘 绍宽、郭凤诰、郭凤鸣、洪炳文、林文潜·····	(213)

八、郡邑后学与乡里后辈：王景羲、周珑、周璟、 黄庆澄、项骧、李笠、戴家祥	(218)
附：梅佐羹匿名诬告案始末	(224)
第六章 孙诒让和瑞安维新人物群	(232)
一、孙衣言重倡永嘉之学	(233)
二、从诒善祠塾到求志社：瑞安维新人物群的形成	(237)
三、理所当然的领军人物：孙诒让	(241)
四、与瑞安其他重要维新人物的异同比较	(244)
第七章 一代宗师 泽惠后世	(270)
附 录	(278)
一、孙诒让著作及主要版本	(278)
二、百年来孙诒让研究之回顾	(283)
三、孙诒让研究论文分类辑目	(291)
后 记	(314)

第一章

孙诒让的家世和生平

孙诒让，清代著名训诂和古籍校理学家，古文字学家。名德涵，少名效洙，字仲颂，又作仲容、中颂，号籀廌，别署荀兼，因被荐经济特科与报捐刑部主事，亦有称征君、比部。他的家乡是浙南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滨海古县——瑞安。孙诒让的一生处于晚清大变局之中，他出生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是鸦片战争后第八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三年。这时清政府腐败已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社会动荡，岌岌可危。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日深，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中国“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他逝世（1908年）后三年，清王朝即宣告覆亡。他亲身经历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衰亡和解体，感受了时代剧变带来的种种劫难。

他是清代学术主流学派——乾嘉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清代三百年朴学的“殿军”。后来在戊戌思潮中成为坚定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旧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文明的前驱者之一，又是清末地方近代兴学中成绩卓著的著名教育家。



孙诒让（1848—1908）

一、孙氏家世与父辈影响

孙氏原籍福建长溪，五代时迁瑞安廿五都盘谷（今潘垵硯下村），世称盘谷孙氏。祖上寂然无闻，家世并不显赫。曾祖祖铎、祖父希曾，都是县学生，是瑞安贫瘠山区潘垵的一个耕读世家。至道光初“遗薄田七八十亩”。希曾因家道中落，且困于举业，转以从事农耕为主，“畜牧耕获必躬为要约，不以顷刻自暇逸”，“早起晏罢，课童奴治田事，暑月草屨蒲扇循行阡陌间不言劳”，其妻“攻苦食淡，躬自勤励”，“手自练治纺织，未尝以任人”，“入夜纺织补纫，……鸡鸣始欲寝”，“至老未尝畜婢”。^[1]

孙氏家庭虽不富裕，但有耕读传家的传统，重视子女文化教育。因两代均未能在功名上有所进取，“益以读书科第望诸子”，把仕进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不遗余力地供儿子读书。诒让的父亲衣言和叔锵鸣，方四五岁，希曾即“口授之经”，“督课之甚严”。他俩天资聪慧，幼时就以能文善诗著称。18岁衣言县试第一，锵鸣第五；府试衣言第四，锵鸣第一；19岁衣言院试第三，锵鸣第一。道光廿一年（1841）锵鸣（25岁）中进士，三十年衣言（36岁）继中进士。孙家“一门二进士”，轰动瑞安全城，传为乡里佳话。兄弟二人在科举路上捷报频传，平步青云，先后进入仕途。

衣言于咸丰二年（1852）起，历任翰林院编修，实录馆编修、纂修，国史馆纂修；“咸丰初，入南书房，教授皇子诸王。又四夷属国遣人来学京师，衣言官国子监并教之”^[2]。继又充翰林院侍讲、文渊阁直阁事等。八年，因对英法联军主战，被简放，引疾归休。同治二年（1863）由曾国藩荐，出任庐凤颍道，并逐步升任江宁盐巡道、布政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等职。因与两江总督沈葆楨不能相合，难有作为，渐萌退志，光绪五年（1879）朝廷召其还朝，封为太仆寺卿。由于为人性骨鲠，终难见容于盘根错节的晚清官场，同年奏明开缺，正式引退，时年65岁。

铎鸣于道光廿四年(1844)任翰林院编修,廿七年任会试同考官,荐中门生李鸿章(后官至傅相)、沈葆楨(官至船政大臣、两江总督),故有“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宰相两门生”之称。廿九年典试广西,留任学政。咸丰三年(1853)自广西归,奉旨留籍(瑞安)办团练前后共十年,擢升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同治二年(1863),擢兵部武会试副考官。因上《劣员虐民酿变请飭查办疏》,参奏温州“苛吏虐民”事,与左宗棠意见不合,于同治三年(1864)被诬“徇私挟嫌,居心实属险诈”,“着即勒令休致”,自此退出官场,时年48岁。此后下半生三十余年,历主苏州紫阳,金陵钟山、惜阴,上海龙门、求志,苏州正谊等著名大书院及温州东山、玉尺、龙湖书院讲席。

到了孙诒让这一代,孙家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已是名副其实的儒宦之家。这为诒让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据其后裔孙师敬《玉海纵横》记载:清制,布政使“养廉银”年白银三万两许,“太公外任官员八九年,所得养廉银二十余万两”,但仍保持着淳朴醇厚



瑞安岙下孙氏旧居

的家风。衣言兄弟入仕“受两朝恩宠”后，父母“自奉未尝稍加于曩时，见人声气未尝稍自异，人亦未尝见其有异也”。同治间全家迁瑞安城内，“其居乡未尝轻入城府，及居城未尝见一官长”^[3]。光绪元年（1875）瑞城新居建成时，诒让撰《诒善堂匾跋》称：“诒善二字，我先人垂示子孙，……其大要不过忠厚朴俭，不专利，不倚势，安分守己，而子弟务令勤苦读书，则所以为善能自得之矣”^[4]。这种淳朴家风，对诒让一生有重要影响。

尤其是衣言、铎鸣二人，人品、学品均堪为楷模。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更对奠定诒让一生成长的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诒让身上处处可见父叔的影子。

衣言、铎鸣兄弟都极富爱国心和正义感。他们在京为官时，清正耿直，直言敢谏，公心为国。鸦片战争中，奸相穆彰阿当权误国，主和议，罢林则徐，兵皆挫败，门生故旧遍及天下，号称“穆党”，铎鸣不计身家安危，毅然上《请罢斥穆彰阿疏》斥之为秦桧严嵩，导致穆被罢，直声震天下。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衣言明知朝廷决意妥协退让，仍极力主战，连上两疏，触犯帝怒，被排出政治中枢，简放安庆知府。

他们退而为民时，仍关怀国事，不忘天下。衣言 80 岁，“以中日战起，力辞不受贺……邸抄至，必召诒让等询战事”，临终前一日“犹询陪京战事，歔歔太息者久之”^[5]。铎鸣 82 岁双目失明，“然终不能忘世，每时事新报至，即命诸子述其要者。丁酉后，海内益多难，每有所闻，即泣涕如雨”^[6]。

衣言、铎鸣兄弟共同以重倡永嘉之学为己任。衣言深感晚清局势与南宋极相似，南宋永嘉之学切合当前抗御外侮、革新政治的时需，赞赏“陈文节、叶文定等相继而起，类皆通经致用”^[7]，推崇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必弥纶以通世变，可谓兼综汉宋之长”^[8]，“能综经义治事之全”^[9]，“不徒以释名辨物为事，亦非空谈经世者可比”^[10]。他力辟世儒汉宋门户之弊，认为“欲通其区畛，

莫如以永嘉之学”^[11]，决心以振兴永嘉之学为己任，表示“衣言幸生诸先生后，读其遗书，窃有志焉”^[12]，被称为“晚清特立之儒”^[13]。

他们出任地方大吏时，都以躬行永嘉之学“兢省物欲，弥纶世变”为为官准则。铎鸣赴广西典试任中，坚却各地官员例宴，坚持不受馈赠，坚拒并退还地方官例赠千余银，却受理当地老百姓递的状纸。衣言在江淮为官，据其后裔《玉海纵横》记载：“他办一大案，六安州一富户犯罪，以十万两银子向衣言太公行贿，请求从宽发落，结果被拒绝，因此，以清明闻于两淮”^[14]。《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载：“自戊辰为监司江南，十载之间历官三行省，始终以廉勤自励，整饬吏治，综核刑名，剔除税厘积弊，严而不苟。至是去官，藩库积羨以钜万计”^[15]，被誉为“出领大郡值军事蜂午，规画井井，及观察江南，起疮痍而休养生息之。……岁丰民和，狱讼衰止，从容以为政，而政声四驰”^[16]。

为使永嘉学派之余绪得以复续，孙衣言从同治三年(1864)起，搜罗永嘉诸儒遗著，以廿年之全力，精心校讎，勘定善本，组织刊刻《永嘉丛书》13种，其中南宋诸儒著述有《水心别集》、《水心文集》、《止斋文集》、《刘给谏集》、《刘左史集》、《浪语集》、《横塘集》，连同函托黄体芳刊刻的《习学记言序目》共8种，使南宋永嘉学派主要著作不致湮没，得以继续流传。为表彰先哲，他与铎鸣分别撰写了《叶水心年谱》、《大郑(伯熊)行年小记》、《陈文节公年谱》、《浮沚先生年谱考略》等。

衣言、铎鸣兄弟都淡泊名利，保持学者本色。以“出为名臣，退为名儒”，“用则行其学于世，舍则传其学于徒”^[17]为人生宗旨，淡于官场进退，把为官和育人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两种选择。衣言引疾致仕后，在致曾国藩信中便表示：“两宋文士往往有外历监司，卒以馆职致仕者。以某之不才，如有此遇，即当拂衣五湖，以我所好”^[18]，并十分赞赏曾氏“公事之余看书如旧”，终身仿行。衣言“素抱在经世，文章兼事功”的处世宗旨，在诒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铎鸣被罢官后有诗：“我生孤僻俗眼白，……一官鸡肋又焉贪！

誓与老农同击壤，息影不离山中庵”^[19]，下半生三十余年从事教育，“门下著籍盖数千人”^[20]；“笃志永嘉诸儒之学，以启迪后进”^[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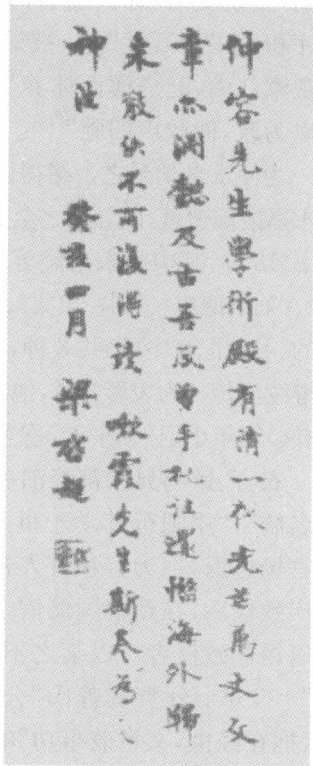
正是父叔辈的这些熏陶，造就了诒让的许多高贵品质，尤其是极其强烈的爱国心，对人生道路目标的选择，终生笃信奉行的永嘉之学，以及执著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熏陶，显然对他的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孙诒让的人生历程

孙诒让一生(1848—1908)61年的历程，按思想发展，以48岁为标志，前期是埋头学问，不问世事，从矻矻“经生”成长为经学大师；后期是维新思想实行家、大学问家，既是学者，又是社会活动家。按年龄与行止经历：童幼年阶段(15岁以前)；随父江淮，学术成长阶段(15—31岁)；回乡全力学术攻坚阶段(32—47岁)；投身维新与学术成果释放阶段(48—61岁)。每阶段大体都在15年左右。

但是，综合学术和思想发展，以主要标志性事件来划分，则以归纳为三个时期最为妥当：学术积累准备期；以《周礼正义》为中心的学术攻坚期；投身维新与学术成果释放并进期。

试作简表如下：



梁启超题跋

1岁(1848)	9月16日(古历八月十九)出生	童幼年阶段(14年)	
8岁(1855)	父授四子书,并授《周官经》		学术积累准备期
15岁(1862)	父出任庐凤颖道,随赴皖	随父江淮学术成长阶段(16年)	
16岁(1863)	读《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		
22岁(1869)	始草创《温州经籍志》		
25岁(1872)	草《商周金识拾遗》成,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以《周礼正义》为中心的学术攻坚期
32岁(1879)	父辞官回里,随归		
38岁(1885)	始阅读《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书	回乡集中力量学术攻坚阶段(16年)	
41岁(1888)	重订《商周金识拾遗》,改名《古籀拾遗》		
45岁(1892)	草创《墨子间诂》,次年成		
47岁(1894)	《札逢》成		
48岁(1895)	撰《兴儒会略例》,筹办算学书院		
50岁(1897)	筹办务农支会,创办蚕学馆		
51岁(1898)	致汪康年信,表态投入变法维新		
52岁(1899)	《周礼正义》定稿,成《周书斟补》、《大戴礼记斟补》,创办化学堂,支持创办方言馆		
54岁(1901)	成《变法条议》,次年易名《周礼政要》刊行		
55岁(1902)	发起成立演说会、劝解妇女缠足会,设立书报经理处		
56岁(1903)	成《古籀余论》	投身维新与学术成果释放阶段(14年)	投身维新与学术成果释放并进阶
57岁(1904)	成《墨子间诂》最后手定本,成《契文举例》;筹采孙坑铅矿,支持引进汽轮开通海上航线		
58岁(1905)	成《名原》,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		
59岁(1906)	任学部二等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		
60岁(1907)	撰《学务本义》、《学务条议》,投入拒款保路斗争		
61岁(1908)	成《尚书骈枝》,辑成《籀庠述林》;6月20日(古历五月廿二)去世		